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走向

庞守英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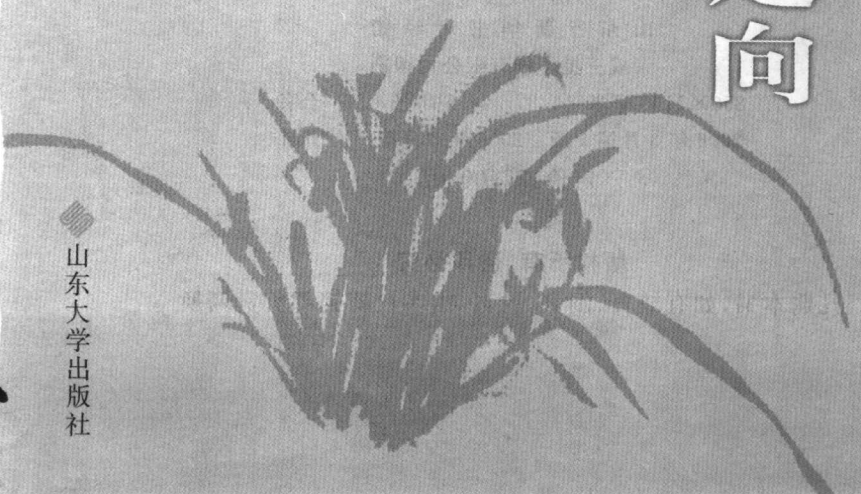
望岳文库 ● 文学史系列

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走向



庞守英 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走向/庞守英主编.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3

ISBN 7-5607-3140-6

I. 新…

II. 庞…

III. 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0989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荣成三星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4.5 印张 362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7.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项目**

前 言

文学精神是文学的灵魂。古今中外流传于世的佳作，大都以深厚的精神被后人所称道。鲁迅先生说过：“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进的灯火。”^①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谈文学精神，谈作品思想，谈作家的责任感，却为许多研究者所不屑。而本书依然认为，文学精神是文学存在的重要的价值要素。文学的成就与辉煌，离不开精神的张扬；文学的尴尬与彷徨，主要是精神的失落；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则更需要新型的精神的支撑。当然，这里所说的精神，并非陈旧观念的翻版，也不简单是时代的传声筒，而是在现代意识的烛照之下以一定的文学形式为载体的“灯火”。

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精神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前期，文学精神狂飙式突进。从精神荒芜的“文革”废墟上走来的作家们，始而为肉体与心灵的伤痕感到悲愤，继而为建国后极左思潮的危害深沉反思，再而为现实的改革呐喊开路。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悲剧

^① 鲁迅：《论睁了眼看》，载《鲁迅全集》第 1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40 页。

意识与悲剧精神汇集在一起,喷涌而出。只不过这种精神更多的是听从了意识形态的指令,显得过于集中统一。文学精神拥挤在狭窄的甬道上,撞车现象、雷同现象时有发生。

文学精神有着广阔而又丰富的内涵。它既有哲学观念上的古典主义、人文主义、启蒙主义、人道主义等等,也有文学理论上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悲剧精神、喜剧精神等等。这种种精神,有时相辅相成,联助互动,也有时表现出矛盾乃至冲突。作家们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往往是把相互关联的精神融汇在一起,形成自己独具个性的精神追求。在意识形态失去了权威统率的情况下,文学的各种精神就容易出现不均衡发展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期的文学精神便是如此。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提升。这在现实生活中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文学不能仅仅在欲望的海洋里挣扎。作家的职责在于人文的关怀与精神的鼓励,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作家创作的目的是“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①。正是在这一点上,有不少作家被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满足于表现对金钱的追逐与性欲的宣泄,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与现实主义批判精神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又严峻的事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人间正道》、王跃文的《国画》等优秀作品,在关注着普通人的生命命运,在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曾经被人们先是热捧后又批判的先锋文学,不管是对它的肯定还是否定,多数都集中在形式的层面。事实上,任何文本的形式都是一定精神内涵的承载,形式和思想是无法分开的。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

^① [捷]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页。

命的关注,不仅在 80 年代后期以陌生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在 90 年代转型之后也依然保留下来。这也即是转型后的先锋文学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区别之所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小说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各种精神纷纷登场亮相,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未曾出现过的。即使在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中被大力提倡的英雄主义精神、民族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变化。特别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60 周年之际,检索一下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就会发现,英雄主义精神正在由阶级的英雄主义向民族的英雄主义转变,由集体的英雄主义向个人的英雄主义转变。而民族精神也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有,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诚然,这些精神还有待于锤炼和提高,有的还处于萌芽阶段,人们还不习惯用一种新的视角去注意它们,乃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惟其如此,更需要加强对这方面的研究,用心呵护,精心培植,以丰富和繁荣文学的精神园地。

在世纪之交的几年中,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的回归。回归并不是简单回复过去。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呼唤与歌赞,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自我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须一瓜的《穿过欲望的洒水车》、《第三棵树是和平》,刘庆邦的《卧底》等作品,便是将艺术视角瞄准人性中的新问题,揭示了人性丑恶的一面。其次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生存问题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必须要解决的便是生存。所谓生

存,并不仅仅指温饱,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生存有着不同的追求与不同的表现方式。近几年来作家们对生存问题的关注,并不主要是人们的吃穿享受,而是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聚焦于生活在底层的弱势群体,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与不幸。有的作家写地处封闭地带的山区农民,那里的生存境况比发达的城市甚至落后了几个世纪,如阎连科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受活》;也有的作家写涌进城市的民工的生存,如孙惠芬的《民工》,荆永鸣的“外地人”系列等。再次是悲剧精神的新生。多年来悲剧受到了冷落。在世纪之交,这一古老的艺葩又重新展放出新的花蕾。一方面是社会悲剧的非亲历性写作。当悲剧的亲历者有意无意地淡忘了伤疤以后,非亲历性作家从客观的角度,以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写出了《中国,一九五七》(尤凤伟)、《夹边沟记事》(杨显惠)、《乌泥湖年谱》(方方)等震撼人心的悲剧。另一方面是性格悲剧的丛出不穷。日常生活中的悲剧,大多数是由人物自身的性格造成的。随着文学边缘化叙事的增长,日常生活越来越多地进入作家的视野。于是,性格悲剧成为悲剧的主要类型。如毕飞宇的《青衣》、《玉米》中筱燕秋、玉米过于要强的性格,熊正良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母亲软弱的性格,《谁在为我们祝福》中徐梅偏执的性格,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中李四过于自尊而又虚荣的性格,都是导致他们走向悲剧的主要原因。作家通过这些人物悲剧的结局,为人们加强自身修养,健全与完善自己的人格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

本课题的研究,力求以“史”为线索,梳理出新时期文学各种精神的走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对某些重要精神,如历史精神、乡土精神等涉及较少。而在论述到的几种精神中,也难免出现不够深刻、不够科学的地方。敬请方家读者不吝赐教,对此表示感谢!

庞守英
2006年元旦

目 录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1)
一、背景与基础·····	(2)
二、恢复与发展·····	(20)
三、尴尬与无奈·····	(41)
四、挑战与超越·····	(54)
第二章 新时期文学的人性与人道主义精神·····	(62)
一、历史的回顾·····	(62)
二、复苏与论争·····	(78)
三、深入与探索·····	(94)
四、人性再拷问·····	(114)
第三章 新时期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123)
一、社会悲剧·····	(126)
二、性格悲剧·····	(138)
三、命运悲剧·····	(151)
四、生存悲剧·····	(158)

第四章 新时期文学的民间精神	(169)
一、草根民间	(173)
二、市井民间	(196)
三、草莽民间	(213)
四、理想民间	(228)
第五章 新时期文学的浪漫主义精神	(246)
一、遥想激情岁月	(252)
二、守望理想家园	(264)
三、寄情自然山水	(278)
四、追求原始神秘	(286)
第六章 新时期文学的宗教精神	(302)
一、宗教文化背景	(302)
二、佛教文化言说	(308)
三、基督教文化言说	(324)
四、伊斯兰教文化言说	(352)
五、文学价值建构的可能	(364)
第七章 新时期先锋文学的先锋精神	(372)
一、基本语境与逻辑起点	(374)
二、叛逆的先锋歌者	(377)
三、人性的冷静直观	(388)
四、存在的孤独迷惘	(396)
五、转型中的精神探寻	(405)

第八章 新时期抗战文学的民族精神·····	(418)
一、文化母题 ·····	(418)
二、爱国情怀 ·····	(421)
三、英雄精神 ·····	(432)
四、反思意识 ·····	(441)
后 记·····	(452)

第一章 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 批判精神

现实主义是文学反映现实的基本规律,是人类在艺术地掌握世界的漫长过程中形成并不断完善的根本方法。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大凡流传久远的杰作,多数是现实主义的,或基本是现实主义的。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现实主义同样是一条基本的流向。20世纪50年代前期,现实主义定位于社会主义名下,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50年代后期,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革命”的前提下结合,被谓之“‘最理想’的创作方法”;60年代初期,现实主义深化;60年代中期到“文革”结束,现实主义沦落为“假大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七年中,现实主义一直徘徊在“歌颂”与“暴露”之间,摇摇摆摆地前行。这种情形直到新的历史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变。新时期伊始,文坛上首先涌现的是现实主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很难设想,如果没有现实主义的恢复,文坛上何以能形成“井喷”状态?80年代文学多元发展,各种探索相继出现,各路作家纷纷登场,寻根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当浮泛的烟云过后,经得起时间筛选与检验的,仍然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之作。90年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涨潮,现实主义显得有些尴尬无奈,但是在强烈的“冲击波”过后,反腐文学、官场文学成

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它们关心当下,直面现实,与社会、与民众融为一体,深得读者青睐。漫漫长河,曲曲折折,起起伏伏,历史的经验教训完善着它,来自各个方面的“主义”滋补了它,终于,它以新的起色跨进了 21 世纪。

研究现实主义,不可忽视的是它的批判精神。现实主义当然要反映社会现实,但是,这里的反映,不是平面呈现,不是机械的“拍摄”、“记录”,而是渗透着作家的主观精神与情感判断。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矛盾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在矛盾的焦点面前,是直面现实,积极介入,还是羞羞答答,躲躲闪闪,是揭露矛盾,鞭挞丑恶,还是掩盖矛盾,粉饰现实,就成为真假现实主义的试金石。“现实主义文学批判精神的思想价值,主要在于揭露和批判世间的阴暗和丑陋、揭露和批判人性的卑劣和弱点,追求理想的人类社会。……现实主义文学思想的理性批判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精神实质,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同样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民族如果淡化了自己的批判精神,那将会是一个跛足的民族。”^①当贫穷、疾苦、丑恶、犯罪还存在的时候,当权力、金钱对人的灵魂还会产生异化作用的时候,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便是不可或缺的。

一、背景与基础

新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起点并不高。一方面,由于作家们对新生活还不够熟悉,对新生活的憧憬、热爱使他们淡化了批判意识;另一方面,在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上存在着片面性,简单地认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

^① 柯平凭:《现实主义文学呼唤批判精神》,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 年第 2 期。

是塑造工农兵正面形象；文艺配合政治，就是歌颂一时的方针政策。弱化批判意识，这在1949年7月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上就定下了基调。周扬在题为《新的人民的文艺》的报告中，一方面肯定了鲁迅的批判精神，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最伟大的启蒙主义者鲁迅曾经痛切地鞭挞了我们民族的所谓国民性，这种国民性正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长期统治在人民身上所造成的一种落后精神状态。他批判地描写了中国人民性格的这个消极的、阴暗的、悲惨的方面，期望一种新的国民性的诞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这种批判精神在中国革命胜利后的今天已经过时了：“现在中国人民经过了三十年的斗争，已经开始挣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所加在我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发展了中国民族固有的勤劳勇敢及其他一切的优良品性，新的国民性正在形成之中。我们的作品就反映着与推进着新的国民性的成长的过程。”自然，人民身上也有缺点，应该进行批评。即使是抱着如毛主席所说的“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热情态度去批评，人民的缺点也还是少批评为好。因为，“比起他们在战争与生产中的伟大贡献来，他们的缺点甚至是不算什么的，我们应当更多地在人民身上看到新的光明。这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新的群众的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特点，也是新的人民的文艺不同于过去一切的文艺的特点”。^①

第一次文代会刚结束，1949年8月上海的《文汇报》就掀起了“可以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的争论。因为这个问题是许多熟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作家尤其是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作家所关心同时也感到困惑的问题。争论的结果，首先强调了“在这个新的时代，在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之下，中国的一般文艺作品，必然要逐渐改变为以写工农兵及其干部为主”，“但是，

^① 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载《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7～518页。

这并不等于在全部的文艺创作中就不可以有一些以小资产阶级的人物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为主角的作品”^①。这一结果,虽然从根本上说,依然没有摆脱机械思维的定势,亦即仍然把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同所描写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与否作了某种程度的对应,但是,毕竟为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非工农阶级在文学作品中争得了一点“主角”的权利,尽管这点权利小得可怜。

从以上有关理论问题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方面的结论:第一,文艺创作要以写工农兵为主,因为他们是新时代的主力军;第二,写工农兵,最好不写或者少写他们的缺点,因为他们的缺点与他们所创造的业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第三,小资产阶级或其他非工农阶级的人物,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只能是工农兵的陪衬而已。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之下,文学创作的批判意识在一定程度上被淡化与忽略。

然而,现实生活并不像理论家们所描述的那样清澈透明。同为工农兵,因其个人经历、生活环境、文化修养的不同,也便形成思想行为上的差异;同属革命队伍内部,工人与农民之间,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也存在着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的不同。即使是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也存在着各种复杂的情况。有不同,有差异,就有矛盾。现实主义就是要正视矛盾,揭露矛盾,鞭挞丑恶现象,推动社会进步。我们的作家正是从这一原则出发,真实地描写生活,触及生活中某些普遍存在的矛盾,表现出了一定的批判精神。

《红旗歌》(刘沧浪、陈怀皑、陈森等集体创作,鲁煤执笔)是建国初期出现的最早的剧本。它的初稿完成于1948年冬,演出及产生重大影响是在1949年和1950年。剧本所写的是解放不久的某城市的工厂,在刚刚发起劳动竞赛的日子里发生的事情。在旧社

^① 何其芳:《一个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载《文艺报》第1卷第4期。

会饱经折磨的女工马芬姐对于竞赛抱着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积极分子大梅等人一心想搞好生产,却不知团结别人,反而歧视、排斥落后工人。有的管理人员仍然沿用解放前那种办法和态度对待工人。作为第一个描写工人生活的剧本,它在颂扬工人高度的竞赛热情的同时,批评了工人中的落后分子,也批评了某些积极分子对待落后工人不是耐心团结教育而只是讥讽打击的不正确态度,以及新解放城市的旧人员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这三种批评指向,是建国初期工厂普遍存在的问题。作品尖锐地揭露了这些问题,以批判的锋芒,为新中国的话剧创作开了一个好头。

这一良好的开端却几乎被扼杀掉。当时的情境是:一方面《红旗歌》公演,在文艺界和人民群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在南京演出时,突破了该地话剧卖座的记录;另一方面,批评的文章接连发表,尤其对马芬姐这一落后工人的形象提出了质疑——“在解放了半年以后的工厂,像马芬姐这样‘顽固’、‘落后’的性格,可能存在吗?解放后工人与工厂关系已经根本改变了,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更正常了;再加上解放初期工人群众的诉苦运动,工人对共产党、解放军以及工厂当局会毫无认识吗?会一点阶级觉悟都没有吗?这是不合乎情况、也不合乎一般规律的。”^①面对这种从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教条主义式的呵责,还是周扬为其作了应有的辩护。他说马芬姐这种“顽固”、“落后”的思想“是完全可能的,现实的,并不奇怪的,就在今天也还是如此”。还有像万国英“那样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不仅在新解放城市的旧人员,而且在老解放区的一部分共产党员的干部中,也是存在的”^②。周扬实事求是地评价了《红旗歌》,保护了一个剧本,捍卫了话剧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

① 萧殷:《评〈红旗歌〉及其创作方法》,载《文艺报》第1卷第11期。

② 周扬:《论〈红旗歌〉》,载《文艺报》第2卷第4期。

萧也牧的《锻炼》、《我们夫妇之间》等中短篇小说，多以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写他们锻炼成长、思想转变的过程。《锻炼》中的主人公马军是抗日战争初期新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他在晋察冀边区参加了“减租减息”运动和对敌斗争，在和劳动人民的相处中，自己的思想感情得到了转变。同时作品以知识分子马军作参照，也批评了农民群众身上存在的愚昧无知、唯命是从、对革命缺乏认识等缺点。《我们夫妇之间》则是通过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写出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妻子——工农干部张同志之间在思想感情、生活情趣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差异，以及双方的融合统一。客观地讲，在男女主人公身上，都存在着与各自的出身相关的优缺点，很难说谁改造谁。他们之间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互为关系。张同志的形象具有深刻的批判价值。她倔强、坚定、朴素、爱憎分明，具备工农干部的优点。但是，她没有文化，思想狭隘、偏执，有急躁情绪，工作方法方式简单化。这正是建国初期干部队伍中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表面看来，似乎是积极、热情、单纯的表现，实际上却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障碍。从后来发展的社会实践来看，狭隘、急躁、简单，恰恰为“左”倾冒进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只可惜，作品所表现的这种批判价值，不仅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反而被庸俗社会学的批评所压倒。“就算她身上还带着一些农民的狭隘保守的观念，也怎么可能描写成为一个经常为些非原则的日常生活的琐事而争的人？”“实际上是把这位女干部丑化了的描写。”^①“写人物写生活都不能这样写的，尤其是写新的工农人民和新的人民生活。这种低级趣味并不是真的人民生活，也不是艺术，而只是你自己的‘趣味’。”^②“这就不能说只是你个人的创作问题，而是使人在文艺界

① 陈涌：《萧也牧创作的一些倾向》，载1951年6月10日《人民日报》。

② 李定中（冯雪峰）：《反对玩弄劳动人民的感情》，载《文艺报》第4卷第5期。